

艺术中国

【英】苏利文◎著 徐 坚◎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The Arts of China

Michael Sullivan

苏利文。国际著名中国艺术史家，先后执教于斯坦福大学和牛津大学。现为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荣退院士。艺术中国。也许是最好的单卷本中国艺术史，四十年来西方最受欢迎的中国艺术基本读物。



新基本书架◆徐 坚 主编

艺术中国

【英】苏利文◎著 徐坚◎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The Arts of China

Michael Sullivan

J120.9/38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中国 / (英) 苏利文著; 徐坚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6.12

(新基本书架)

书名原文: The arts of China

据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翻译

ISBN 7-5355-4937-3

I. 艺... II. ①苏... ②徐... III. 艺术史

- 中国 - 教材 IV. 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0923 号

Copyright© 1999 by Michael Sulliv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苏利文先生经徐坚先生授予本社,

独家所有, 请勿侵权!

艺术中国

(英) 苏利文著 徐坚译

责任编辑: 李军

湖南教育出版社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网址: <http://www.hneph.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h.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6 开

印张: 16

字数: 25 万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55-4937-3/G · 4932

定价: 48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译本序

徐坚教授邀请我为他所翻译的拙著的简体字版作一短序。拙著初版于1961年，书名略有差异，迄今为止已经多次修订，印行40余年了。在此期间，不仅我们的中国艺术史知识随着新发现迭出而得到极大拓展，我本人对中国艺术史的理解也在不断变迁之中——希望愈臻成熟。因此，徐坚教授所翻译的版本和此前版本大有不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历史和艺术史的写作应当随着我们的知识的丰富和对过去的态度的变化，而保持与时俱进。毫无疑问，本书最终将被那些反映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的后来者所超越。

趁此机会，我希望表达对中译本的欢迎，因为它表明在中国还有很多潜在的、对其自身艺术传统抱有感兴趣的读者，即使这是一本由外国人撰写的中国艺术史。某些读者可能会对我的方法，或者我的疏忽深感讶异，但是通过一个旁观者的眼睛去看自己的文化和艺术应颇有参考价值，因为有时候它能揭示身处其中者习而不察的东西。我希望中国读者能体谅我在事实和理解上可能出现的差错，我也欢迎他们的批评和指正。对徐坚教授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在拙著中文版上所投入的心血和劳动，我深表谢意，并祝他们成功。

Richard Sullivan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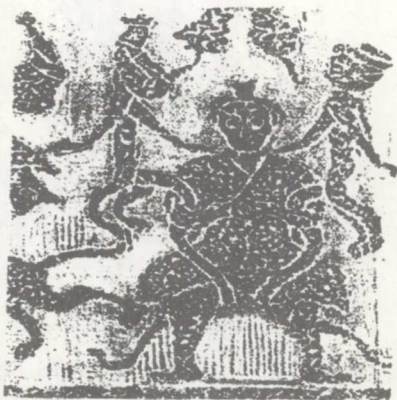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历史文明的曙光 /1
- 第二章 商代艺术 /10
- 第三章 周代艺术 /30
- 第四章 战国时代艺术 /39
- 第五章 秦汉艺术 /54
- 第六章 三国六朝艺术 /81
- 第七章 隋唐艺术 /106
- 第八章 五代与两宋艺术 /130
- 第九章 元代艺术 /169
- 第十章 明代艺术 /186
- 第十一章 清代艺术 /210
- 第十二章 20 世纪中国艺术 /234

第一章 历史文明的曙光

对于推崇中国艺术的西方人而言，过去的半个世纪是一个充满了动荡和挫折的时代，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明显地否定，有时甚至摧毁自己的文化遗产。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它的大门却几乎完全封闭，只对那些完全没有批判精神的追随者开放。大多数中国人开始逐渐摆脱信仰的控制，艺术和艺术家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

然而，即使是在艺术家和学者被囚禁，或者被发配到农村和工厂的最困苦的时代，考古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事实上，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在发掘、保护、研究和展示其文化遗产方面，做得比过去更多。与其说这是出于毛泽东所提出的“古为今用”的政治需要——必须让“古”能为“今”所见，还不如说，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能够时时感知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不曾消磨的历史感。中国人常常回顾他们的历史，将其当成获取力量的丰沛源泉。对于他们文化的活力而言，这是必不可少，而绝非可有可无的。

古老的传说也从未被遗忘，其中一个是关于世界的起源的。在遥远的过去，宇宙混沌一团，一天混沌初开，上面变成了天，而下面变成了地，两者之间出现了最早的人——盘古。每天盘古长高十尺，而天向上升十尺，地向下陷十尺。一万八千年后，盘古死去。他的头分裂成日月，他的血汇聚成江海，他的毛发变成森林和草地，他的汗水化作雨，他的呼吸化作风，他的声音变成雷电——他是我们人类的祖先。^①



盘古。作为古史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神祇，盘古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的益州石刻之中。盘古崇拜可能起源和流行于南方，直到秦汉之际才传入中原地区。此石刻出自河南南阳，现藏于南阳汉画馆。

①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早期中国人信仰宇宙自衍，而没有创世神话。牟复礼(Frederick Mote)采纳卜德(Derk Bodde)的观点，甚至认为这个故事自境外传入中国。但是，这个故事广为流传的事实说明它至少满足了普通民众的某些需求。



伏羲女娲图。出自新疆
哈拉和卓古冢的唐初遗物。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个民族起源的传说往往暗示着在他们心中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故事也不例外，它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亘古观点：人不是造物的终极成就，在世间万物规则中只占据了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历史记忆。与壮观瑰丽的世界和作为“道”的表现形式的山川、风云、树木、花草相比，人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其他任何文明都没有如此强调自然的形态和模式——人只能顺其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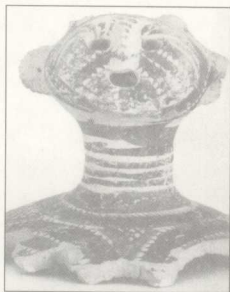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将这种认知的根源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当时，华北的自然条件比现在要温和得多。50万年前，即北京人的时代，这个地区相对来说温暖而湿润，大象和犀牛在茂盛草地上逡巡，全然不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荒山秃岭、寒风掠过的高原景象。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西和陕西一带，产生了独特的天人合一的中国式认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哲学、诗歌和绘画中得到极致发挥。和谐感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和美学，它同样也有实用价值，因为农夫的富足，乃至社会的繁荣，都取决于对四季时节和顺应天意的理解。由此甚至演化出一种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农业仪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皇帝礼仪性地在第一垄田地中耕耘，这不仅仅是希望保佑这一年的好收成，也借此表明与自然力的亲和。

“顺应天意”的想法是中国思想的基础。人类不仅要与天意，也要与周围的其他人保持和谐。按照逐步扩散的圆圈模式，这种和谐由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开始，向外推广。因此，历史上最崇高的理想常常是发现万物的秩序并与之保持和谐。随着本书对中国历史的逐步展开，我们将发现，其特性和独具之美就在于这种和谐感的表达。这是否就是那些对中国文明其他方面兴趣索然的西方人也会如此狂热地收集和推崇中国艺术的原因之一呢？也许，他们也能感觉到中国艺术家和工匠所创造的形式乃是“自然”的形式？那些形式作为对自然韵律的本能回应，而不可避免地借助创作者的手表现出来。中国艺术没有像印度艺术一样，要求我们

致力于沟通物质形态和暗喻内容两个看起来不可沟通的极端,也没有像西方艺术一样,包含不被亚洲人所接受的形式和思想等预设观念。中国艺术的形式的优美来自于它们内在的最广泛、最深刻的和谐感之中,我们之所以能欣赏它们是因为我们也能感觉到自身周围的韵律,并且能够本能地回应它们。这些韵律,即通过线条和轮廓所表达出来的内在生命的感觉,在中国艺术最起始的阶段就已表露无遗。

步入石器时代

今天,每一个中国艺术的倾慕者对新石器时代精美的彩绘陶器都耳熟能详,但是,在1921年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中国曾经有过石器时代。那一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和他的中国助手有两项至关重要的发现。一个是在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在一个山坡的断崖上,安特生捡到一些燧石工具,这表明这个地区曾经居住过非常古老的人类。他本人没有进行发掘,但是他的发现却导致进一步发掘的展开,最终由裴文中博士发现了化石骨骼。这些骨骼属于生活在更新世中期的北京中国猿人。除了晚期爪哇人之外,北京人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古老的直立人种了。洞穴中保留的厚达15米的文化层表明在70万年前到20万年前之间,北京人就生活在这里。北京人以脉石英为原料,通过从一块大鹅卵石上敲击薄片制造石质工具。他们已经会用火,多食谷物,偶尔也以同类为食,他们会凿开同类的骨骼



安特生和甘肃人面彩陶。安特生以北洋政府地质矿产顾问的身份来华,最终却成为一个著名的考古学家。安特生因1921年开始的两项重大发现——北京化石人和仰韶彩陶而声名鹊起,因“彩陶文化西来说”而遭到中国学术界的贬抑。甘肃人面彩陶代表了新石器时代三维人像艺术的高峰,现藏于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馆。

以吸取其中的骨髓。

近年来也不时发现更古老的遗存。1965年在云南元谋地区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的年代被推断为距今约170万年。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山坡上的一处理藏中,古生物学家发现了人类头盖骨,并推测它们的年代至少比北京人早10万年,即大体和爪哇人同期。更晚近的发现在1984年,辽宁南部的金牛山发现了年代在更新世中期26万年前的原始人骨骼,即金牛山人。金牛山人 的大脑比同时期原始人大脑容量更大,因而和早期智人有某种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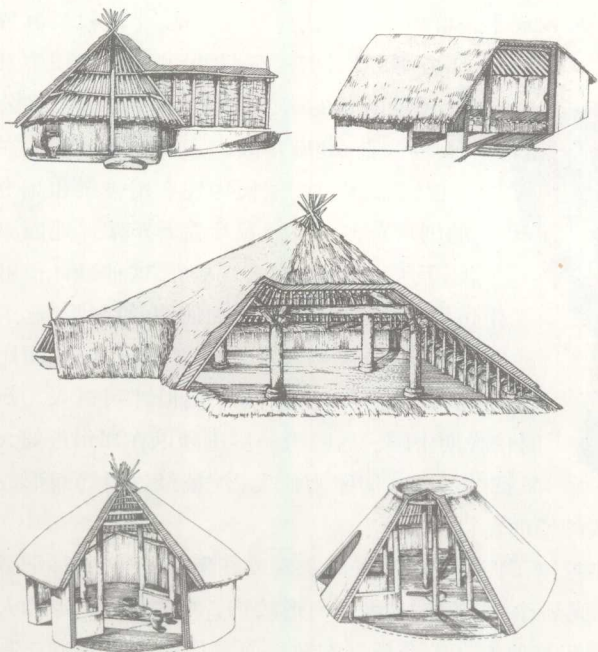
到更新世晚期,中国早期人类的进化速度加快。近年来,很多地区都发现了智人文化遗物。周口店山顶洞人已经拥有比他们的祖先更多的石器工具,男性已经穿着用兽皮缝制的衣服,而女性则佩戴穿孔石珠和涂抹赤铁矿粉末来妆扮自己。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早的有意识的化妆行为。在宁夏和鄂尔多斯地区的沙漠遗址中发现了精致加工的细小石器类型,各种不同类型的石刃和石片被用于不同的目的。1960年,在河南北部,即后来成为商代最后的中心区域的地方,一个居址上发现了上万件细石器。远在西南的四川、云南和贵州也有丰富的遗物出现。尽管这些零星分布的遗址的年代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不甚清楚,但它们的分布至少证明在向中石器时代慢慢过渡的过程中,旧石器文化已经分布到古代中国广幅领域的各个角落。

华北的新石器时代文明^①

①综述参见Kwang-chih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4th ed.

中石器时代的人们以渔猎为生。当“新石器革命”到来之时,中国人的祖先已经定居下来,开始建筑村寨,学习农艺、蔬菜种植和制陶等工艺。每一次新的考古发现都将新石器革命向历史纵深推进一个阶段。在本书写作之际,最重要的早期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是洛阳周边的一个村落。大部分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于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这里正是中国文明的摇篮地区。遗址中发现了房屋地面、墓葬、畜养动物的证据,以及有简单纹饰的粗糙陶器的碎片。通过碳14测年,考古学家将裴李岗文化的年代推定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②

②本书碳14年代均经过校正,但仍需谨慎对待。



新石器时代房屋复原。
见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房屋大小有别，多是半地穴结构。后世华北民居的众多特征已经在新石器时代露出端倪。

早期中国文明进步的下一个阶段，早在安特生在河南寻找矿藏的过程中就为人熟知了。安特生在一个名叫仰韶的村落中发现了随葬精美彩绘陶器的简单墓葬，并命名为“仰韶文化”，以此标识公元前5000—前3000年中国史前史的重要阶段。1923年，安特生注意到仰韶陶器和古代近东地区陶器的相似性，于是西行至甘肃，试图发现与之相关的遗址，并在半山发现了包含非常近似的陶器的墓葬。然而，中国考古学家在华北不同地点也发现了大量的彩陶遗址，因此，现今很少有人再提及其与西亚的关联了。

仰韶文化最重要的发现出现在1953年。考古学家在西安以

人面鱼纹盆和舞蹈纹陶盆。作为叙事型绘画风格彩陶的代表，两件陶器分别出土于陕西西安半坡和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图像的内容和意义尚无定论，但应该与新石器时代的精神生活有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鹰鼎。出自陕西华县太平庄墓葬中，是新石器时代雕塑艺术的代表作。现藏于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



陶壺。出土于山东胶县三里河。细泥质、表面经抛光的黑陶器是山东龙山文化的代表器物。彩陶与黑陶之间不仅仅存在技术、年代和地域的差异，更揭示出审美情趣和文化认同的分别。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东的半坡发现了一群新石器时代村落和墓地。半坡村落群覆盖面积多达1万平方米，在深达3米的文化堆积中发现了4个不同时代的房屋居住层面，这表明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间，人类频繁地居住在这个地点上。最早的居民居住在用枝条和泥土搭建的圆形草棚中，屋顶覆盖着芦苇，地面涂抹灰泥，房屋中间设置一个火塘，这种设计很可能是模仿早期的帐篷或蒙古包。他们的后代建起了木骨栽桩的长方形、圆形或正方形房子，房屋地面比屋外地平面低一米多，通过一连串台阶才可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民居的进一步进展以在郑州近郊大河村发掘的三联式房屋为代表，泥墙经过烘烤而形成坚硬又耐久的墙面。

半坡陶工们既生产粗糙的灰陶或红陶，也生产一种细腻的红陶，抛光后涂抹黑彩，多为几何形纹饰，偶尔也有鱼形和人面纹饰。看起来他们还不会使用陶轮，而是用泥条盘筑方法制作陶器。他们也用泥土制作纺轮甚至发簪，但是更精致的器物，比如针、鱼钩和箭头都是骨制的。部分半坡和大河村村庄遗址已搭建屋顶保存，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博物馆。

彩陶最先由安特生发现，随后在河南和甘肃等多个地点出土，无论在质量上还是美感上都是其他新石器时代用具所无法媲美的。其种类主要包括墓葬用陶罐、敞口深腹盆、高领带耳罐，尽管陶器器壁非常薄，形体却很粗壮，大方的轮廓往往通过用粗糙的毛笔施加黑色颜料形成的纹饰得到巧妙的强化。有的设计纹样为几何纹饰，包括平行带状纹，或者包含了平行四边形、十字或钻石状的菱形纹饰。器身下部常常是不带装饰的，可能为了防止侧倾，陶器是栽埋在沙地中的。很多陶器上装饰了水波状纹饰带，并集合形成一种漩涡状纹饰。而另外的陶器上则出现了高度抽象的人物、青蛙、鱼和鸟等形象。甘肃马家窑发现的碎片上甚至显示出一种非常复杂的用笔技巧，即在描绘植物时，叶子的顶端往往形成一个尖钩，乃是提笔画成的。这种技法与3000年后宋代画家画竹子时的笔法如出一辙。自然主义的母题比较罕见，纹饰以几何图案或者高度抽象化的纹饰为主流，其意义至今还不甚明了。

直到相当晚近,学者们都或多或少地认为,仰韶文化直接被一种以山东为中心,以抛光龙山黑陶为代表的截然不同的文化所替代。但是,一系列新发现使简单的场景被更复杂而有趣的模式所替代。首先,通过碳14测年分析,马家窑和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发现的彩绘陶器已经确切可知比仰韶村所发现的彩陶要晚2000年,而後者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 4865 ± 110 年。这个证据显示确实存在从中原地区的仰韶中心向外的扩散运动。

多年前,日本考古学家在当时称为满洲里的地区发现了红山文化的遗存,红山文化与仰韶相关,但也有其自身的显著特点。红山遗址的近期发掘揭示出一种石板墓葬,周围存在一圈由圆柱体陶土制品组成的围墙,这些陶土制品和日本历史时期古坟周围的埴轮非常相似,而在中国却没有类似的发现。这里也发现了巨石平台,看起来像是用作祭坛,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发现了一个体态强壮的、用于丰产仪式的陶制女神像,这是个两眼填充玉石的彩绘陶制人脸形象。这里还发现了一些雕刻的玉器动物形象,中国考古学家称之为“玉猪龙”。红山文化被推断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

继续向南,我们来到山东和江苏北部的新石器文明(大约公元前4300—前2400年),正如张光直所说,当地的新石器文明“被命名为青莲冈文化或大汶口文化,完全取决于命名由江苏考古学家还是由山东考古学家提出”。在古代,这个地区比现在要温暖,湖泊和沼泽中遍布鳄鱼。早期大汶口文化就已经出现了装饰红白两色卷云纹饰的陶器,显然和仰韶文化有关。

再向南就到了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相关,年代在公元前5000—前3000年。当地居民是濒水而居、种植水稻的农民,他们已经驯养了猪和水牛,他们猎杀鳄鱼、象和鹿。他们的工具和武器由木、骨和石等各种质地材料制成。丰衣足食之余,他们制作形态和纹饰变化多样的陶器。某些陶器上甚至刻画了原始符号或“文字”,但是工艺仍然相当原始,看起来还没有陶窑,所有陶器都是露烧而成的。

跨过杭州湾就到达余姚县的河姆渡,这里在历史晚近时期是陶瓷工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至少和半坡一样年代久远、由水面上构筑的木板房屋组成的大型村落。房屋的柱子和梁通过榫卯结构精巧地结合在一起。当地的居民也种植



鹳鱼石斧图。出自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的陶罐上。有学者提出鹳和鱼是不同族群的图腾,而石斧代表权力,鹳鱼相争的场景是部族间冲突和战争的表现。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泥塑女神头像。出自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牛河梁神庙所从属的红山文化可能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

水稻。他们制作一种器壁很厚的磨光黑陶，有些陶器在烘烤之前装饰了一些精美的花草或植物的纹样。尤其引人注意的是，1977—1978年在河姆渡发现了一个红色髹漆木碗，这是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漆器工艺的例子。

仅就目前所知而言，文明进步的关键一步是由华北地区的龙山文化的居民带来的。1928年，吴金鼎（1901—1948）博士在山东龙山发现和确认了龙山文化。在龙山居民所使用的陶器中，最著名的是由磨光黑陶制成的精致的蛋壳陶器。这种陶器呈现出不可思议的脆弱感，常常被刮削到只有半个毫米厚的薄薄一层。其形状非常优美，而纹饰主要由凹凸线和环绕圆圈构成，使陶器具有一种金属感和机器生产的气息。可以想见，蛋壳陶器的制作应当非常困难，更不用说使用了。在随后的青铜时代里，这个传统完全消失了。山东潍坊的发现表明“黑陶文化”同时也制作一种充满活力和原创精神的白陶陶器，白陶鬲可以视为典型器物。陶鬲看起来像是模仿由兽皮制成、用藤条绑缚在一起的器物。龙山居民也有占卜的习俗，即解释动物的肩胛骨加热之后形成的裂纹的占卜方法，长期以来这种习俗被认为直到商代才出现。

地处更南方，与龙山文化相关的文化首先见于良渚，随后在长江下游的其他遗址都得以发现。就像年代较早的河姆渡文化一样，良渚文化的居民的房屋和工具也多是木质的，他们生产一种精心抛光的黑陶和玉礼器、玉工具。玉器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

若干新石器时代文化（比如仰韶、半坡和大汶口）的陶器上



白陶鬲。出土于山东潍坊，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器物形态上流露出来自游牧文化的影响。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

①关于新石器时代中国的玉器生产和有玉器出土的考古遗址，参见 Jessica Rawson, *Chinese Jades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 28–29, 111–236.



玉龙。出自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现藏于内蒙古翁牛特旗博物馆。



丁公陶文。出土于山东邹平。十一个字符刻于一平底器残片上，字符自上而下，自右而左，共排五行。有人推测属于早期东夷文字系统。现藏于山东大学。

都带有符号或标记,看起来像是中国文字的原型。迄今已确认了大约200多个这样的符号。然而,它们是否构成一种书写形式仍然值得讨论,因为“书写”这一术语表明这些符号可以发音,并能被广泛理解,而且按照一定的语法结构联系在一起。只有以上这些属性都能被证实时,我们才能够判断这些符号究竟是族属或居民的标记、计数符号,还是记录语言的原始形式。

尽管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质工具都是精心制作和加工的结果,但大多数仍是诸如锄、刮削器和斧等实用工具。石斧是商代武器“戈”的原型。这些工具中最精良者由抛光玉石制成。新石器时代玉器种类包括环、玦、璜,以及由北方红山文化居民制作的漂亮的动物形装饰。显著带有礼制性意义的玉器包括璧和琮,璧是中间有圆孔的圆形盘状物,而琮则是内圆外方的管状物。在太湖北岸寺墩的一座良渚文化墓葬中曾经发现多达33件玉琮,其中最高的达到33厘米,而墓葬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2700—前2200年。有的玉琮上带有动物形纹饰,与商代饕餮纹饰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在缺乏金属工具帮助的情形下,加工这些玉琮所需要的大量劳动意味着它们必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礼制或象征意义,但是,究竟它们对新石器时代居民意味着什么,仍然不得而知。

尽管我只是非常简要地勾勒出一个画面,但仍然可以说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其最晚的一个阶段,石器文化逐渐融入了青铜时代的潮流。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甚至已经尝试了简单的金属工艺,这可以在马家窑发现的长达10厘米的铸制铜刀(约公元前3000年),三里河发现的铜锥和河南南部王城冈发现的青铜器残片(两者都属于公元前2500年的龙山文化)以及甘肃齐家坪发现的铜工具和刀(可以推断在公元前2000年)为证予以说明。尽管这些发现相当零碎而稀少,但它们显示,向一个全面发展的青铜文化的过渡,这个过程比我们之前所想象的更为漫长。



黑陶高柄杯。出自山东日照东海峪遗址。胎壁极薄,有“蛋壳陶”的美誉,应该是专用于礼制生活的奢侈品。现藏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玉琮。出自江苏武进寺墩良渚文化墓葬M2中。这是目前所见最高的玉琮之一。玉琮是良渚文化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玉琮语出《周礼》,但在吴大澂《古玉图考》之前尚不能确定其实物形态。

第二章 商代艺术

好几个世纪以来，河南安阳附近小屯村的农民常常在雨后或者犁地时，从田地里捡到一些奇怪的骨头。有些骨头经过抛光，像玻璃一样闪光；大多数在背面有成行的椭圆形钻孔和T字形裂纹；少数甚至有看起来像是原始文字的符号。农民们将这些骨头带到安阳和邻近的城镇，出售给中医，而中医则将这些符号铲平，以“龙骨”的名义卖出去，将其作为一种恢复元气的药用成分。1899年，一些带刻画符号的骨头流传到知名学者和收藏家刘鹗（1857—1909）手中，刘鹗辨认出这是一种比当时已经知晓的周代青铜礼器上的金文更古老的书写符号。很快，以罗振玉（1866—1940）和王国维（1877—1927）为代表的学者，都投身到商王室档案碎片的研究中。在当时，中国史学家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商的存在，尽管他们是笃信不疑的。^①

这些甲骨被追溯到安阳。农民们开始更卖力地向纵深挖去，不久以后，北京和上海的古董市场上出现了非常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和其他器物，然而它们的出土地点却一直被讳莫如深。连续近30年中，农民和古董商们往往在夜间和冬天农闲的几个里，持续不断地疯狂盗掘商代墓葬。直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展开一系列重要的发掘，最终第一次用确凿无疑的考古学材料证明商代确实存在，而不是像某些西方作者所怀疑的那样是擅长追溯回忆的中国人制造出来的善意的假象。到1935年，超过300座墓葬被发掘，其中10座规模宏大，无疑是王室墓葬。

这些发现引出了更多的问题。谁是商人？他们从哪里来？他



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南地。骨卜术缘起于山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到商代时大盛，成为殷王室通过先公先王与天帝沟通的重要途径。

^① L. Carrington Goodrich, "Archaeology in China: The First Decad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 no. 1: 5-15.

们的早期遗存如何揭示一个高度复杂的文化面貌，特别在青铜器技术上？如果商确实存在，那么更早的夏代的遗存也有可能被发现。

传统上，中国人相信他们是黄帝的后裔，黄帝继承伏羲，伏羲创造了八卦，并由此而产生了书法艺术。神农发明了农业并学会使用草药。接下来是尧、舜，最终是大禹开创了夏朝。在这些传说人物的身上，中国人将他们所珍视的事物都一一个性化了：农业、善政、孝道以及书法艺术。现在大家都认同，所有这些人物都是相当晚的时期创造或想象出来的。尧、舜、禹最早出现在周代晚期的文献中，而黄帝则很有可能是道教的产物。

1950年之前，我们对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于安阳的商代遗址。安阳是商王盘庚在公元前1320年前后建立的，而最终于公元前1050年前后为周朝军队所征服。在安阳，青铜文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金属工匠们以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都无法与之匹敌的高



马麟《夏禹王像》。南宋画作展示了公众理念中的圣王意象。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铜爵。出自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这是中国境内所见年代最早的铜器之一，但其铸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铜牌饰。出自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宝石镶嵌工艺是青铜时代早期的特色之一，此后并不常见。



铜鼎。出自河南郑州二里冈遗址。年代为商代前期。



铜钺。出自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墓葬之中。铜钺被认为是一种象征军事和刑伐权力的礼制性兵器。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质量生产祭祀器具，可以说，这是数世纪发展的结晶。甲骨上发现了盘庚之前 18 位商王的名字，按照传统记载，商人在最终都于安阳之前曾经五次迁都。如果这些早期都城能够被发现的话，那么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安阳纯熟的青铜文化之间的空白就可以被填补。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开始在河南北部和山西南部所谓“夏墟”地区寻找真正青铜文化的开始。他们发现了 100 多个遗址，其中文化最丰富的是位于洛阳和偃师之间的二里头。二里头有建立在台基上的宫殿、陶制圜墙、镶嵌了绿松石的青铜器和玉器。考古学家将二里头文化分成四个阶段，大体对应公元前 1900—前 1600 年。从第三期开始，出现了一种用来温酒和注酒，被称之为“爵”的简单但形态优雅的器具。爵是目前为止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礼器之一，也是成熟的商代青铜器的雏形。^①

学者们争论的是，到底二里头的四个阶段都属于夏代（长期以来都被认为只存在于神话之中），还是仅仅只有较晚的两个阶段属于夏代。但是，如果没有文字资料证据，任何遗址都不能够毋庸置疑地被称之为“夏”，而迄今为止也确实没有发现任何文字资料。二里头也不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个突飞猛进，因为正如意

①Robert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 vol. 1.